

对“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质疑

叶明德

【提要】 笔者对近期学术界关于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并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论断提出疑义,认为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这一结论缺乏科学性,有的学者用来评估人口转变进程指标的有效性值得怀疑,同时对人口转变时代与后人口转变时代的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认为,过早地宣布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已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不仅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而且对实际工作有可能产生误导。

【作者】 叶明德 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000年年初以来,在有关学术刊物上可以陆续看到一些文章称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并已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例如,《南方人口》2000年第2期上发表的李建民的《中国的人口转变完成了吗?》一文指出:“我们认为20世纪末我国人口转变过程已经结束,在步入21世纪的同时,我国也将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2期发表的于学军的《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一文指出:“中国人口在90年代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历程,开始进入低生育时期,所谓的‘后人口转变’时期”。《人口研究》2000年第3期发表的“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一文写道:“我们得出明确的结论:我国人口转变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完成,开始步入后人口转变时期。”

然而,读了这些文章后,笔者感到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并已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结论颇值得怀疑。在此将自己的一些想法提出来,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怎样确定评判人口转变是否完成的标准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应当选择哪些指标?二是怎样确定这些指标的标准值。

于学军只选用一个指标,即生育率。他认为中国出生平均预期寿命已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水平,因此“考察中国人口转变是否完成了第三阶段,应主要看生育水平的高低和状态稳定与否。”^①

“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选用了两个指标,即生育率和出生平均预期寿命。他们在《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一文中写道:“我们可以根据两个标准判定人口转变是否完成:一是生育率水平是否降到更替水平以下($TFR < 2.1$);二是人口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是否达到或高于规定的老年人口年龄下限,即65岁。”

李建民采用比较判断法来考察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他以中国1998年的有关人口指标为基点设计了四个指标用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1)出生平均预期寿命等于或大于69.5岁;(2)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等于或小于1.9;(3)人口出生率等于或低于16.5‰;(4)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10‰。

我们知道,西方人口转变论者对人口转变阶段的描述不尽相同,如兰德里的三阶段模型、汤普森的三阶段模型、诺特斯坦的三阶段模型和四阶段模型、科尔和胡佛的四阶段模型、布莱克的五阶

^① 于学军:《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2期。

段模型等,然而对人口转变基本过程的认识是一致的。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起始阶段,经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过渡阶段,最后达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完成阶段。换言之,所谓人口转变,就是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由高位均衡向低位均衡的转变。因此,从统计学角度衡量人口转变完成与否,最直接、最有效的指标是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上述文章作者中,只有李建民直接使用了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这两个指标,然而所有作者都回避了死亡率这一指标。他们是以出生平均预期寿命指标来替代死亡率指标,以生育率指标来替代出生率指标。然而事实表明,用上述两个替代指标来评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进程,缺乏应有的灵敏性和有效性。

平均预期寿命确实能反映死亡率的高低。出生平均预期寿命高,说明总死亡率尤其是低年龄段死亡率低。但是在评估人口转变是否完成时,出生平均预期寿命指标无法直接与出生率进行比较,以观察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的均衡状态。再说,就算出生平均预期寿命高,死亡率低,那也只说明该人口处于转变之中,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口转变已经完成。1981年中国人口出生平均预期寿命就超过65岁(为67.88岁),而这一年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仍处于20.91‰和14.55‰的较高水平。更为明显的例子是,90年代中期尼加拉瓜的出生平均预期寿命已超过65岁(为66岁),然而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仍高达38‰和32‰,在这样的增长水平上人口总量22年就要翻一番。可见,出生平均预期寿命的高低与人口转变完成与否并无多大直接联系。

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它能最终决定人口增长的方向。然而,这一指标用在不同的人口转变模式中其灵敏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是人口转变的自然结果,以此来评判人口转变完成与否显然非常有效。然而在中国,情形有所不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不是自然形成而主要是政策控制的结果。尽管90年代中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但这仅仅意味着人口零增长、负增长的内在机制业已形成,并不等于人口零增长、负增长已成为现实,甚至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已实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人口低增长。1998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仍为9.53‰,比同期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高8.53个百分点,这种增长率70多年人口总量就要翻一番。

要准确评估人口转变是否完成,除了要选择有效的指标外,还有一个如何为这些指标确定标准值的问题。确实,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叫“低”,目前并无明确的、公认的统一标准,但这并不等于标准值问题就无法解决。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人口转变的过程,这些国家的经验数据是有参考价值的。

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人口转变现象并率先完成人口转变的国家。表1给出的是19世纪中叶以来法国人口自然增长的状况。

据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搜集的资料,旧制度时期法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保持在40‰上

下的高水平,但到19世纪中叶,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明显下降,自然增长率已降到很低的水平。从表1中可以看出,一百多年来,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是相对的、动态的,但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低位均衡状态是比较稳定的;与此相应,自然增长率也一直较低,19世纪中叶以来(除1953年因受二战后

表1 19世纪中叶以来法国人口自然增长状况 ‰

年份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831~1835	29.6	26.0	3.6
1896~1900	21.9	20.6	1.3
1953	18.9	13.1	5.8
1982	15	10	5
1998	12	9	3

资料来源:1831~1900年数据引自王瀚明:《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第185~187页;1953年数据见沈益民编:《近三十年世界人口普查和人口概况》,第72页;1982年数据引自邬沧萍主编:《世界人口》,第87页;1998年数据见美国人口咨询局编:《1999年世界人口数据表》。

“婴儿热”影响有所回升外),基本上保持在 5‰及以下的水平。

如果说法国的例子从纵向展示了人口转变完成状况,那么,我们还可以从横向考察人口转变完成状况。表 2 给出的是 1982 年北欧和西欧国家的“三低”状况。

表 2 1982 年北欧和西欧人口自然增长状况

‰

国家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国家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北欧				西欧			
丹麦	11	11	0	奥地利	12	12	0
芬兰	13	9	4	西德	10	12	-2
挪威	12	10	2	卢森堡	12	12	0
瑞典	12	11	1	荷兰	13	8	5
英国	14	12	2	瑞士	12	9	3
				比利时	13	12	1
				法国	15	10	5

资料来源:邬沧萍主编:《世界人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 87 页。

从北欧、西欧当代人口转变完成状态看,“三率”的指标值大体如下:出生率 10‰~15‰;死亡率 8‰~12‰;自然增长率 5‰及以下。美国人口咨询局《人口手册》(国际版)曾把芬兰作为人口转变的一个典型例子。芬兰人口转变第四阶段即完成阶段(1970~1976 年)的“三率”是:出生率 13‰;死亡率 10‰;自然增长率 3‰。

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均衡状态可以从自然增长率上得到反映。从理论上讲,出生率与死亡率低位均衡的典型状态(或中心值)是人口零增长;一般状态应在低增长与低负增长之间,其数值一般在 -5‰~5‰之间。上述欧洲国家的经验数据与这种理论分析是基本相符的。然而在李建民的评估指标体系中,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标准值定为“低于 10‰”。这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经验数据上看都显得过于宽泛,上限值几乎超出经验数值 1 倍,其有效性不能不叫人怀疑。

二、中国人口转变是否“已经完成”

“人口转变”的提法源于西方的人口转变论(最初的提法是“人口革命”,1945 年美国学者诺特斯坦称人口革命为人口转变,此后一直沿用)。这是西方学者试图对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初欧洲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做出合理解释而创立的理论。欧洲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是一个客观存在,用马尔萨斯的理论已无法解释,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说明,于是人口转变论便应运而生。由于人口转变的事实在前,理论解释在后,而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又不可能一次完成,这就决定了人口转变理论的形成需要有一个过程。就整个世界而言,目前只有不足 20%的国家与地区已经完成人口转变,而 80%的国家与地区人口转变尚在进行之中。地区间的差异性决定了各地区人口转变的过程及模式的不同。人口转变的某些形态尚未充分展现出来,因而时至今日,这一理论尽管一直在修正和补充,但仍不能说已臻于完善。然而,它的现实指导意义是不容怀疑的。

西方人口转变论者都将人口转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考察,将其看成是工业化、城市化和整个社会现代化的产物。事实上所谓人口转变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发展所经历的一场根本性变革。因此,评估人口转变是否完成就不能只考察人口状况的外部表现(即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的高低),而要同时看人口转变的机制(包括人口内部运行机制和外部制约机制)是否形成。

中国人口转变完成论者在做出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这一重要结论时,其根据仅仅是他们自己所设立的一些量化指标,其方法基本上是比较法,或称比较判断法,就是将中国人口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做量的比较。李建民在《中国的人口转变完成了吗?》一文中较详细地介绍了这种方法。其“分析和判断逻辑如下:首先以我国 1998 年有关人口指标水平为基点,然后确定西方发达国

家达到相同或相似水平的时间,如果我们可以认为在这些时间维度上,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那么我们也就可以判定我国的人口转变也已经完成。”诚然,这种方法从形式逻辑角度看是严密的,问题是这种考察比较仅仅局限于人口转变的外部表现形式。即使这些比较指标都准确而有效,单凭对外部形式即量的比较而未深入进行内在机制的考察和分析就匆匆下结论,这种结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是值得怀疑的。目前中国的人口状况与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状况相比实属形似而神异,某些统计指标的相同或相似无法掩盖许多实质性的差别。

西方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尽管原因各有差异,对其解释也形形色色,但从总体上看是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西方著名人口转变论者诺特斯坦就曾经把用社会经济发展来解释人口变动称为“人口转变的标准解释”。经济的发展,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的增大,教育的发展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都促使人们从追求孩子数量转向追求孩子质量,从而对人口增长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就其实质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低位均衡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结果。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主要是政策控制的结果。“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生育率下降的主导因素是计划生育政策,大致占60%~70%”^①。中国现代化程度还不高,尽管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对人口增长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广大农村仍然以体力劳动为主,社会保障覆盖率很低,“养儿防老”仍然是农民的实际需要,长期形成的养儿“传宗接代”的习俗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低生育率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尚未真正形成。于学军等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育龄妇女的低生育水平背后还有诸多不稳定因素:育龄人口数量还没有达到峰值,庞大的育龄人口中蕴藏着巨大的“生”机;社会经济发展对中国人口增长仍在起“双刃剑”作用;低生育水平状况下仍存在出生性别比问题、人口统计数字问题(出生瞒报)、生育权和人权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是人口转变尚未真正完成的表现。如果人口转变“已经完成”,像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起“双刃剑”作用之类就很难加以解释。

此外,中国由于实行“急煞车”式的人口控制,生育率由高到低的转变是在二三十年内完成的。当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时,人口年龄结构相对而言还比较年轻。这种年龄结构从两个方面对人口增长造成影响:一是育龄人群庞大,形成强大的惯性增长,使人口出生率与同等生育水平的发达国家比较相对较高(这种惯性增长还将持续二三十年,即使维持目前的生育水平,人口总量也还要增加3亿多);二是老年人口尤其是高龄人口的比例相对较低,从而使死亡率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较低(目前发达国家平均人口死亡率为10‰,比中国高3个千分点左右)。这一高一低,影响了目前中国出生率与死亡率低位均衡状态的形成。1998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6.03‰,死亡率为6.50‰,前者是后者的近2.5倍。

从根本上说,上述差别源于国情的不同、人口转变模式的不同。中国属发展中国家,国际国内环境不允许我们重复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道路。中国的人口死亡率转变属于外生性转变,在工业化起步之际就已降到很低的水平。高出生率伴随着很低的死亡率,造成强大的人口增势,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压力。严峻的形势促使我们寻求新的人口转变道路。我们的做法是对人口发展实行强有力的外部干预,包括政策制约、思想开导、利益诱导等,用以规范人们的生育行为。通过这种努力,我们有效地抑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并最终使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为将来实现人口零增长和负增长打下了基础。然而就人口转变的过程而言,路还没有走完。如果说我们“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那也只是从统计学意义上说的。诚如江亦曼、姚宗桥所说,中国目前的这种人口转变“不是经典意义上的转变,是不彻底的人口转变”,原因很清楚,在中国尚未形成人口转变完成状态的稳定的内在机制,低生育水平并不稳固。政府干预对中国人口转变进程起了催化作用,这种

^① 翟振武等:《稳定低生育水平:概念、理论与战略》,《人口研究》,2000年第3期。

作用虽然有效,但也有限。从某种意义上说,稳定低生育水平比起降低生育水平任务更复杂、更艰巨。只有通过长期的综合治理,营造了低生育率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使人们的传统生育需求和观念得到彻底改变,才真正有资格宣布人口转变已经完成。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但不是现在。

三、怎样划分人口转变时期与后人口转变时期

中国人口转变完成论者都认为,中国的人口发展已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这“后人口转变时期”是怎样的呢?李建民在《后人口转变论》一文中对此作了解释并从较长的时间跨度上对人口发展演变过程作了时代划分。

看了李建民所做的人口发展演变模型,人们难免要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人口转变作为人口发展的一个完整历史过程,它的终点在哪儿?换言之,后人口转变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时期,它的起点在哪儿?

在这个模型中有一个“准均衡”阶段。根据模型提示,其主要特征是:人口总量由低增长趋向于零增长和负增长;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这个阶段被归并于后人口转变时代。

对于这样划分人口转变时代与后人口转变时代,李建民的解释大致是:当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类型时,人口转变即告完成;其后的人口发展走出了人口转变论的视野。根据他的模型和解释,人口转变时代与后人口转变时代的交接点或分界线是低出生率与低死亡率条件下的人口低增长。

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法有待进一步推敲。因为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考虑:

其一,人们通常确实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看成是人口转变的完成状态,然而这只是一简单明了的概括说法,不能理解为人口转变完成状态只限于人口低增长,不包含或者排斥人口零增长。人口转变完成状态还有一种概括说法,那就是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低位均衡,这种说法可以将人口低增长、零增长甚至低度负增长都包含在内。

其二,人口低增长、零增长、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等现象并未走出人口转变论的视野。如果说,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及以下是人口转变的重要特征,那么出现人口零增长和负增长就是人口转变的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西方早期及当代著名人口转变论者对人口零增长和负增长都有所论及,并将这种人口形态纳入人口转变的某一阶段。例如,兰德里将这种形态纳入他的三阶段模型的第三阶段;诺特斯坦将这种形态纳入他四阶段模型的第四阶段;布莱克将这一形态纳入他五阶段模型的第四、第五阶段。

其三,后人口转变时代的起点在哪里,是人口低增长形态吗?后转变阶段的概念是西方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引起人口学者关注后转变阶段的不是人口低增长,而是人口零增长和负增长。40~60年代,欧美国家都经历了短暂的人口出生率回升,接着便是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更为显著的出生率下降,欧洲一些国家陆续出现人口零增长和负增长。这种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更引起了人们的某种担忧。显然,若出现无限期的人口负增长,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人口学家们提出在后人口转变时期出生率与死亡率将再度恢复均衡的假设是自然而然的。如此看来,在人口转变进程中将出现两次零增长:一次在人口转变完成阶段;再一次作为一种假设有可能会出现在后人口转变阶段。显然这两次零增长的人口学含义是不一样的。在李建民的模型中,这两次零增长的起点和终点都定在“后人口转变时代”,其合理性是值得研究的。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人口转变时代与后人口转变时代的交接点应是人口转变进程中第一次出现的人口零增长,而不是“人口低增长”。

四、过早宣布中国已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有可能产生误导

中国人口转变完成论者一致认为中国已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然而笔者则认为,这一论断不仅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而且对实际工作也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甚至有可能

产生误导。

在西方国家,人口转变发生在工业社会,“后人口转变”则与所谓的“后工业社会”相对应。后工业社会也好,后人口转变也好,人们既然将其视为特定的历史阶段,必然有其特定的问题或主要矛盾。西方学者对后人口转变的关心,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人口缩减的担忧。由于人口零增长、负增长现象的出现,有些人认为当今欧洲正处于“人口的冬天”。美国有的学者甚至预测人口缩减会波及全球,出现持续的人口规模衰减,甚至会导致世界人口减少一半。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也许将来某个时候中国也会出现类似当今欧洲一些国家那样为人口衰减而担忧的现象,但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毕竟还很遥远。

从中国国情及我们所能预料的情况看,中国人口就是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也会表现出一些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总和生育率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下降,因而将来在一定时期内负增长的势头要比西方国家来得迅猛。其次,我们虽然也要尽量避免过快过猛的负增长,但并不惧怕负增长,倒是希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低度负增长,以便使人口总量逐渐达到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适宜的水平。

目前,中国正处于人口转变的惯性增长阶段,中国步入“后人口转变”时期至少是在21世纪20年代之后(翟振武等,2000)。现在就宣布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已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有可能在客观上产生以下负作用:

其一,掩盖中国目前人口过多的问题。将目前严重过剩的中国人口与正在担忧其缩减的发达国家的人口归为一类,容易使人们产生模糊认识,看不清首要问题之所在。

其二,模糊人口工作的主攻方向。中国未来几十年的人口工作目标是稳定低生育水平,争取人口总量由低增长逐步过渡到零增长,随后再继续缓慢下降,逐步减轻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然而,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工作目标主要是防止人口过分缩减。正如李建民所说:“处于后人口转变时代的国家政府基本上都转向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一些国家如日本、法国、俄罗斯等甚至患上了‘低生育率恐惧症’。”既然如此,过早宣布中国已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显然不利于正确把握主攻方向。

其三,助长麻痹松懈情绪。于学军、杨书章曾举出10条理由说明稳定当前的生育水平不比从前降低生育水平的工作简单和轻松。可是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存在麻痹松懈情绪。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宣布中国已经完成人口转变并已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这不仅无助于消除麻痹松懈情绪,而且有可能对这种情绪起推波助澜作用。

参考文献:

1.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人口研究》,2000年第3期。
2. 李建民:《中国的人口转变完成了吗?》,《南方人口》,2000年第2期。
3. 于学军:《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2期。
4. 李建民:《后人口转变论》,《人口研究》,2000年第4期。
5. 李竞能主编:《当代西方人口学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6. 顾宝昌编:《社会人口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1992年。
7. 王渊明:《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8. 沈益民编著:《近三十年世界人口普查和人口概况》,群众出版社,1983年。
9. 邬沧萍主编:《世界人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
10. 翟振武等:《稳定低生育水平:概念、理论与战略》,《人口研究》,2000年第3期。
11. 江亦曼、姚宗桥:《21世纪稳定低生育率的战略和政策》,《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5期。

(本文责任编辑:朱 犁)